

《狂人日记》尾声三节： “礼教吃人”主题之深化及“忏悔意识”之表述

张秀丽

(南通大学文学院, 江苏 南通, 226019)

摘要:千百年来,“仁义道德”一直被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精义的代名词,而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却将其判定为“吃人”的,着实令人瞠目结舌。学术界对《狂人日记》的研究可谓成果颇丰,但是针对其主题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小说的前十节,对尾声三节的解读多停留在对“救救孩子”的呼吁上。其实,小说的后三节回归鲁迅寄意其中的反传统文化主题,蕴含其中的忏悔意识及其反抗绝望的哲学蕴涵,也为我们带来更为强烈的审美感受。尝试运用新批评的细读法来对尾声三节作出读解不失为一种新的研究视角,以探寻鲁迅先生对封建社会的“家族”、“血缘”等对人进行道德绑架的概念是如何进行前无古人之批判的,他是如何借狂人的视角来对历史和自身进行反思与自审的。

关键词:鲁迅;《狂人日记》;礼教吃人;忏悔意识;反抗绝望

中图分类号:F249.2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一场声势浩大的思想启蒙运动,新文化的倡导者们率先将西方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引入中国,使得当时知识界和青年学生中的有识之士开始反思中国传统文化,反思传统旧道德。鲁迅是其中最为典型的先驱人物,他在《狂人日记》中大胆地揭示出“仁义道德”之赤裸裸“吃人”的本质,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如今,学术界对《狂人日记》的研究成果颇丰,大致可以分为思想意蕴的全面开拓、狂人形象的百家争鸣、艺术表达的异彩纷呈这三个方面。而针对思想主题开掘的研究大都集中在小说的前半部分,而对后面三节的解读多停留在“救救孩子”的呼吁上。小说第三节“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1]447}千百年来,“仁义道德”一直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精义的代名词,是中华民族两千多年来安身立命之根本,如今却被鲁迅先生借一个狂人之口判定为“吃人”,着实令人瞠目结舌。至第十节狂人劝周围的人:“你们立刻改了,从真心改起!你

们要晓得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1]此处的规劝与此前狂人的发现遥相呼应,小说情节就此达到了高潮。因而对这些情节的读解也向来更为研究者们所青睐,其实,小说的后三节回归鲁迅寄意其中的“礼教吃人”反传统文化主题,蕴含其中的“忏悔意识”以及其“反抗绝望”的哲学蕴涵,也为我们带来更为强烈的审美感受。

一、“礼教吃人”反传统文化主题之深化

“太阳也不出,门也不开,日日是两顿饭。”^[1]狂人只日日两顿饭就被打发,自家的“大哥”像圈养动物似的将他禁锢起来,过着不见天日、出不得门的日子,毫无自由可言。然而即使在这样的境遇中,狂人依然在继续着他的关于“吃人”的思考,这一次他是从记忆深处将自己亲历的往事一件件翻捡出来。狂人想到那仅有 5 岁的妹子,“可爱可怜”,居然也被活活地给“吃”了。只有 5 岁的小女孩,虽然没有太多浓墨重彩的描写,也可以想象她的一颦一笑该是多么可爱而美好,她的生命是多么的幼小而

收稿日期:2016-11-26;修回日期:2017-01-13

基金项目:江苏省南通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资助项目(YKC16050)

作者简介:张秀丽,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E-mail: 15010002@yjs.ntu.edu.cn

引文格式:张秀丽.《狂人日记》尾声三节:“礼教吃人”主题之深化及“忏悔意识”之表述[J].南京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7(1):37-40. [doi:10.13960/j.issn.2096-238X.2017.01.008]

充满生机,按常理来讲,她与这个世界是没有任何纷扰的。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可爱可怜的小生命为狂人所在的大家庭所不容,可见吃人者以及“吃人”制度有多么的惨无人道。更让人觉得匪夷所思的是:这个吃了“我”妹子的人正是“我”的大哥,狂人十分确定,“晓得妹子死掉的缘故,也全在他。”^[1]由此可见,封建社会中的骨肉血亲之间在上演着“吃”与“被吃”的人间惨剧,可以确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吃人勾当就是从家庭的至亲之间开始的。正如钱穆所说:“家族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最主要的柱石,我们几乎可以说,中国文化,全部都从家族观念上筑起,先有家族观念乃有人道观念,先有人道观念乃有其他一切,人道观念的核心是家族,不是个人,个性被溶解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情感中,成为不折不扣的无我之人。”^[2]鲁迅以这样的书写,将其批判的锋芒指向了家庭血缘关系,从根本上撬动了中国礼教吃人的传统文化以及与其相依存的家族制度。这样就将前十节的“吃人”主题又推向了更深的层次。

仔细斟酌文章意蕴会发现,鲁迅在文章中对于妹子“被吃”的原因一点儿也没有提及,这可谓“此时无声胜有声”,用意颇深。儒家思想以血缘为基础建立了一整套以等级为特征的家族制度,又由“亲亲”扩大为“尊尊”,将家族制度推衍至国家,形成维护一国统治的宗法等级秩序,长幼有序、尊卑有别。西汉时期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三纲五常”之说,也就是所谓的三纲原理和五常之道。在董仲舒看来,人伦关系中的君臣、父子、求全责备这三种关系是最主要的,同时这三种关系之间存在着天定的、永恒不变的关联:君、父、夫为主,臣、子、妻为从,即所谓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但除此以外,女性还必须受“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的约束。由此可知,在中国最卑贱的莫过于女性,女性没有独立的人格,只是作为男性的附属品和一个生殖工具而存在,而女孩的存在则更显得可有可无,她们自然而然成为卑贱者中的更卑贱者,被各层等级重重地压在社会的最底层。一旦家庭宗族利益需要替罪羊的时候,当“仁义道德”需要“吃人”的时候,女孩便不得不被作为牺牲品。所以,狂人5岁的妹子因为女性身份特征以及年龄小辈分低,处于食物链的最底端,便被十分合乎情理地给“吃”了,用以充当封建礼教的祭品。

在狂人所在的整个大家庭当中,父亲一直是属于不在场的失语者,所谓长兄如父,父权仍高悬于

子女头上。因而大哥是占据统治地位的家长代表,他是封建礼教的卫道士,更是封建礼教的化身,妹子就是被他吃掉的。对此,“母亲想也知道,不过哭的时候,却并没有说明,大约也以为应当的了。”^[1]母亲属于封建统治压迫下被迫失语的女性形象,她已经被封建礼教扼杀了人性。她因妹子之死而“哭个不住”,但是同时她的母性已经被冷血无情的封建礼教所吞噬了,所以她只尽管哭,并不去说明什么。无论是妹子的被吃,还是大哥的残忍,于她而言这一切都是“应当的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母亲作为“看客”一定程度上也是礼教的维护者,她与大哥一起构成了“吃人”的文化语境,而“我”在无意中也或许和他们一起参与了“吃人”的行为,“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大哥正管着家务,妹子恰恰死了,他未必不和在饭菜里,暗暗给我们吃。”^[1]狂人的反思并不是不无道理,既然认定是大哥将妹子吃了,那么“我”和母亲同在这样一个大家族中无意间也吃了妹子的肉也是理所应当的了。当然,这个大家庭中的每一个人都有吃了妹子几片肉的嫌疑。因而狂人对自身的处境开始担忧,“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现在也轮到我自己,……”^[1]狂人所在的封建大家庭当中,“吃”与“被吃”已然是一对恒定的存在,只要吃人在继续着“吃”人,那就意味着必然要有人继续做牺牲品来“被吃”,在狂人的意识中,或许下一个人就是他自己。由此可见,在中国封建礼教的桎梏下,每个人都在参与着吃人行为,同时也面临着“被吃”的危险,这就是家族制度统治下的“无我之人”的命运,这就是封建礼教文化阴影笼罩下所有中国人的生活境况。鲁迅沉痛地发现中国人是“人吃人”的人,中国社会是“人吃人”的世界,中国人有四千年的“吃人”履历。狂人一家就是整个封建社会的缩影,通过对狂人所在封建大家庭之境遇的书写,鲁迅将礼教文化制约下所有中国人的生存状态穷形尽相,这又使小说的反传统文化主题走向更深层次。

二、“忏悔意识”之表述

“狂人”先是在历史的缝隙中发现了“仁义道德”之“吃人”——泯灭人性、剥夺人的个性独立与自由的真相,而后他一改以往受虐式的胆怯,转变成英勇的启蒙者,竭力地“劝转”周围那些“吃人”的人——家族制度的维护者。劝他们务必要改,“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1]然而狂人的启蒙是

具有前卫性的,与那个时代的大家庭格格不入,所以这带给他的只能是被当做一个彻头彻尾的疯子给禁闭了起来。正是在这样的境况下,狂人的思想越发地走向深刻。“劝转”他人无果后,狂人对“吃人”世界的一系列恐怖发现和痛苦是深刻而真诚的^[3]。他通过审视自己5岁妹子的“被吃”遭遇,发现不仅大哥吃了妹子,就连整日以泪洗面怀念女儿的母亲也或许难逃罪责,甚至他怀疑自己也是“吃人者”的一分子,更同时面临着“被吃”的处境,狂人的“罪感”与“忏悔意识”由此生发。他意识到了自己可能无意中也是“吃人者”,这是他不同于其他启蒙者的伟大创见。至结尾部分,“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现在也轮到我自己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得见真的人。”这可以说是将整篇文章的自审意识和忏悔意识推向了顶峰。“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可以说是对我们民族的一种自况和承担。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所信奉的金科玉律——“仁义道德”之“吃人”历史的发现,以及对这种惨无人道的“吃人”历史的自审、忏悔和批判是“狂人”作为一个对民族忏悔的承担者的巨大贡献。“狂人”有着非凡的勇气。有了认识、有了想法的人也许有很多,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勇气呐喊出来。而“狂人”却义无反顾地说出了我们的国土竟是“四千年时时吃人的地方”!忏悔是以一个人的勇敢为底气的。有了认识,有了勇气,才有真心的忏悔^[4]。

很明显,小说中的狂人与鲁迅的精神是同构的,“尤其是小说的最后两节,那逻辑是多么严密,哪里还有先前的那种疯气……分明是在向公众推行启蒙思想了”^[5]。鲁迅说,悲剧就是把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坏了给人看,他作为一个具有深刻的悲剧意识的思想家与文学家,在他的“忏悔意识”的表达上,也是具有深刻的悲剧色彩的,那就是救赎的无望,乃至绝望。所以,“狂人”的忏悔的归结点就落在了“没有吃人的孩子身上,于是‘救救孩子,……’成了‘狂人’作为民族忏悔者化身的深沉而真实的忏悔的绝响。

三、“反抗绝望”之哲学体现

在鲁迅的身上,读者可以看到非常浓郁的“知其不可为而为”的精神特质,他明明知道现实难以改变,甚至无法改变,却偏偏要与现实“捣乱”,这也正是他的伟大之所在。其实,正如尼采骨子里是一个悲观绝望者一样,正如尼采的超人是打扮成希望

的绝望一样,鲁迅的所谓希望,常常也不过是强打精神做出的笑容^[6]。鲁迅文学叙事的底色是绝望,力度就在于在绝望之中执著地反抗绝望。不过,他又说:“绝望之为虚妄,正如希望相同!”绝望与希望一样最终同堕于虚无,也就是说,绝望的底色并没有根本改变^[7]。鲁迅的绝望当中蕴含着深厚的希望意识,可以说,正是因为这种绝望决定了鲁迅先生的小说具有了无限的生命力。鲁迅说:“有时故意地填以没奈何的自欺的希望。希望,希望,用这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虚中的暗夜的袭来,虽然盾后面也已然是空虚中的暗夜。”^[7]鲁迅作为一位进化论的信仰者,在意识到忏悔并不能产生实际性的效果,即无法得到救赎之后,他便将其所有的期望完全寄托在“孩子”身上。狂人尾声的呐喊,即是鲁迅“反抗绝望”的体现。他对现实世界病态的人生是寄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尽管他对现实的“父母之邦”产生了绝望,但他至少还寄希望于“孩提之邦”,对人类的未来持有信心、抱有希望。“与绝望抗争”是鲁迅源于启蒙而又高于启蒙主义的精神特征所在^[8]。

此外,鲁迅借狂人之口发现了正是“仁义道德”将人置于纷繁复杂的伦理关系中,只见义务,不见权利,个人被繁杂的关系和义务所吞噬,难见个性自由与人格独立。正如梁漱溟所说:“中国文化最大之偏失,就在于个人永不被发现这一点上。一个人简直没有站在自己立场说话的机会,多少感情要求被压抑,被抹杀。”^[9]中国人所生活的社会其实就是一个家族,所身系的各种关系就是四面八方的亲属关系或者说伦理关系。中国人一生下来,就始终处在与他人的伦理关系中,人被置于伦理关系中,因伦理而尊重对方,由此而生发出对他人的各种义务,人生于世,只有义务观念,全无权利观念。李泽厚也曾明确指出:“强调血缘纽带是‘仁’的一个基础含义。”^[10]而以血缘为基础的家族制度中的人并不被重视个人精神欲求。可见,“仁义道德”统治下,没有真正的“个人”,只有家族、国家中的“无我之人”。所以,“鲁迅认定,中国人只有首先祛除思想深处的各种‘奴隶性’,在精神领域得到洗礼之后,才可能真正享有民主自由。除此之外,别无他途。”^[11]鲁迅也曾经痛心地指出“中国之治,理想在不撄”。这“不撄”的理想,规定着世世代代的人们的思维方式,教诲着人们既不要去直面或改变严酷的现实,又不要去坦诚地披露或触动内心真实的思想,只能沿着既定的思想和精神轨道,按照定型的道德伦理规范去思想和行动^[12]。而鲁迅发现了

“人”,中国2 000 多年的传统历史书上,满篇都写着“仁义道德”四个字,骨子里却是赤裸裸的“吃人”。的确如此,中国的历史很少表现出人性的光辉。这是一个紧紧围绕专制权力的黑暗制度,所有的一切都以权力为中心运作,这里没有人性的位置。五四启蒙运动最大的贡献就是发现了“个人”的存在,鲁迅宣扬“个人的自大”,认为“一切新思想,多从他们出来,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从他们发端。所以多有这‘个人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多福气,多幸运”^{[1]327},这种对“个人的自大”的渴望与呼唤,实际上就是要求出现充满自觉意识和独创精神的人,充分发扬这种个性的力量。鲁迅所呼吁的,正是希望中国人能够有自由而独立的灵魂。对于鲁迅而言,他所怀有的自审、忏悔意识以及蕴寓其中的反抗精神,不仅是一种道德的自觉、灵魂的自律,更是一种文化批判和文化反思。

四、结束语

现代思想家张中晓曾在他的《无梦楼随笔》中谈到自由在现代社会的重要性,只有在自由中,人才可能发现他真正是怎样的。只有作为个人,才会感到欢乐和痛苦,才会承担责任,才会做出好事与坏事。他同时也指出,一切美好的东西必须体现在个人身上。一个美好的社会不是对国家的尊重,而是来自个人的自由发展。这些都意在突破传统思维的禁锢,希望每一个个体能真正地有对独立人格的追求和自由精神的向往,成为真正意义上的

“我”。《狂人日记》的尾声三节可以看作是“反传统”启蒙文化主题的延续、忏悔意识的表达、反抗绝望哲学的表述。鲁迅先生对封建社会的“家族”、“血缘”等对人进行道德绑架的概念进行了前无古人的批判,同时借狂人的视角对历史和自身都进行了反思与自审,这体现了他独特的眼光与视角,是鲁迅对传统文化的个性化批判。

参考文献:

- [1] 鲁迅. 鲁迅全集:第1卷 [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 [2] 钱穆. 中国文化史导论 [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51.
- [3] 夏楚群.《罪与文学》中的非典型文本——《红楼梦》《狂人日记》“忏悔说”辨析 [J]. 南方文坛,2015(5):105.
- [4] 陶卫东. 忏悔意识下的鲁迅和巴金 [D]. 长沙:中南大学,2007;23.
- [5] 王晓明. 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 [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296.
- [6] 王彬彬. 残雪、余华:“真的恶声”?——残雪、余华与鲁迅的一种比较 [J]. 当代作家评论,1992(1):42.
- [7] 曹禧修.《第七天》与鲁迅文学传统 [J]. 小说评论,2013(6):80.
- [8] 耿传明. 试论余华小说中的后人道主义倾向及其对鲁迅启蒙话语的解构 [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7(3):80.
- [9] 梁漱溟. 中国文化要义 [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221.
- [10] 李泽厚. 中国古代思想史论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7.
- [11] 禹权恒. 鲁迅与胡适:互为镜像的知识分子 [J]. 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127.
- [12] 王光斌. 传统文化孕育的怪胎——阿Q性格的文化解读 [J]. 文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3):240.

Detailed Readings of the Last 3 Chapters of *Madman's Diary*: Deepening Cultural Theme of “Etiquette Cannibalism” and Expressing “Repentance Consciousness”

ZHANG Xiu-li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Nantong University, Nantong 226019, China)

Abstract: For thousands of years, the theme “benevolence and morality” has always been synonymous with the essenc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but Lu Xun’s *Madman’s Diary* has determined it to be “etiquette cannibalism”, which is astonishing. The research on *Madman’s Diary* can be construed as fruitful in academic circle, but research into this theme mainly concentrates on the first ten chapters of the novel,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last three stays on the appeal of “saving children”. In fact, those chapters are a return to Lu Xun’s theme of anti-traditional culture, which contains philosophical implication of repentance and despair, and brings us a stronger aesthetic feeling. It is a new attempt to use close reading, an approach in new criticism, to interpret the last three chapters, to study the ways in which Lu Xun fiercely criticized some moral concepts such as “clan” and “blood”, and how he rethought history and himself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dman.

Key words: Lu Xun; *Madman’s Diary*; etiquette cannibalism; repentance consciousness; resistance to despair